



大学生素质教育立体化精品教材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主编 管雪梅 何忠泉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管雪梅, 何忠泉主编.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21.9

ISBN 978-7-5215-0405-7

I. ①中… II. ①管… ②何… III. ①中华文化—高
等学校—教材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160129 号

责任编辑 常晓迪

封面设计 易 帅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河北铄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88 千字

印 次 2021 年 9 月第 1 版 202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15-0405-7

定 价 46.8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上讲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

的确，文化映现了民族的社会生活，记录了民族的发展历程，承载了民族的共同情感，也展示着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对于深入认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提升民族自信心，树立爱国主义信念，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思想观念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强化现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提高其文化修养，我们特编写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一书。

本书首先着眼于全景式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发展和基本精神，随后概括地介绍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中国传统史学、中国传统教育、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国古代宗教、中国传统艺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本书力求在传递知识的同时，拓展学生的人文视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陶冶学生的人文情怀。

本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体例新颖。本书设有本章导读、学习目标、知识延伸、

小贴士、知识回顾、知识巩固等模块，有利于提升课程教学成效。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的通识教育教材，也可作为社会相关人员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参考用书。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日后修订完善。

编者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 第一节 文化概述 2
-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背景和发展历程 6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 29
- 第四节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和方法 31

第二章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 第一节 先秦子学 36
- 第二节 两汉经学 47
- 第三节 魏晋玄学 50
- 第四节 隋唐佛学 51
- 第五节 宋明理学 54
- 第六节 清代实学 56

第三章 中国古代文学

-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60
-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特征 69

- 第三节 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 71

第四章 中国传统史学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 78
- 第二节 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88
- 第三节 优秀的中国古代史学文化传统 90

第五章 中国传统教育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历程 96
- 第二节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粹 105

第六章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 第一节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概述 112
- 第二节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发展历程 114

第三节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 基本内容	117
-----------------------------	-----

第七章 中国古代宗教

第一节 宗教概述	132
第二节 中国远古宗教	133
第三节 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化	135
第四节 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化 佛教	139
第五节 儒学的宗教化	146

第八章 中国传统艺术

第一节 书法艺术	152
第二节 雕塑艺术	156
第三节 戏曲艺术	161
第四节 绘画艺术	163
第五节 建筑艺术	168

第九章 中国传统民俗文化

第一节 人生礼仪	180
----------------	-----

第二节 岁时节日民俗	183
第三节 生产民俗	187
第四节 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 传承	190

第十章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

第一节 天文、数学、中医 药学	194
第二节 农学、陶瓷、造船、 纺织、冶炼等技术	198
第三节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202
第四节 中国古代科技与古代哲学 思想	204
第五节 中国近代科技发展迟滞的 原因	206

参考文献

第一章

Chapter 1

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本章导读

从整个世界的文明与文化发展来看，古代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民族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在本章中，首先概述文化的概念和特性，其次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背景和发展历程，随后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最后介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和方法。

学习目标

1. 熟悉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区别；
2.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背景；
3. 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4. 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5. 掌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和方法。

第一节 文化概述

一、“文化”界说

什么是文化，应该如何界定它的内涵？这是古今中外研究文化的学者们都会遇到的一道难题。

1952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合著的《文化——有关概念和定义的回顾》一书列举了西方学术界从1871年到1951年80年间出现的“文化”定义多达160余种，其中尚不包括中国、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种种“文化”定义。从1952年至今，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世界各国、各地有关“文化”新的定义仍然层出不穷。就我国而言，仅从20世纪80年代重新出现的“文化热”现象以来，各家关于“文化”的定义，其数量之多，就已经达到很难精确统计的地步。给“文化”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没有争议的确切定义，这是中外所有文化研究者的愿望，然而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究其原因，大概一方面是由于多维视野的文化理论的争鸣与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语源学角度上各种语言歧义的客观存在。依据不同的文化理论，自然会得出不同的“文化”定义，而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文化”一词的内涵也是不尽相同的。

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既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固有的传统词汇，又是近代以来外来语言的翻译语汇。

在中国固有的语言系统中，“文化”是“文”与“化”这两个字的复合。“文”字最早可见于商代甲骨文，像身有花纹袒胸而立之人，后引申为各色交错的纹理，并进而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文德教化等。“化”字出现稍晚，不见于甲骨文，有改易、变幻、生成诸义，初指事物形态和性质的改变，后被引申用于教行、迁善等社会意义。

“文”“化”二字的复合使用，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事情。《周易·贲卦·象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是指天道运行的自然规律；“人文”，是指人际纵横交织的社会关系、人伦规范和风土民情等。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治理天下者需通过观察天文来把握周围环境变化发展的节律和方向；同时还需观察人文，因势利导，随宜教化，以求得理想格局的实现。”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关联，“因文教化”或“以文教化”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至西汉，刘向在《说苑》中始将“文”“化”二字正式联为一词，该书《指武》篇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其后，晋人束皙在《补亡诗·由仪》中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意思是“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十分明显，在汉语系统中，“文化”一词的本义是与“武功”“武力”相对的，

是指以文德教化天下，这里面既有政治主张，又有伦理意义。

作为翻译语汇的“文化”，当初是借用了日文译词，其词的原型是拉丁文“cultura”，含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多重意义。英文作“culture”，最初有改良土壤、栽培植物、种植树木等含义，并由此引申出教育、修养、人类能力的发展、礼貌、知识、情操、风尚等意义。这就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一词所具有的“文治教化”内涵比较接近，所以，学者们便用“文化”来对译“culture”这一外来语汇。

然而，中国传统的“文化”与西方传统的“culture”在词义上是有着明显区别的。“文化”的本义是身上雕有花纹的人，它强调的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侧重于精神领域；而“culture”则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进而引申到社会领域和精神领域，它的本义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毋庸讳言，后者较之前者，有着更为深广的内在意蕴。

另一方面，这两个词汇又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即都强调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主体是人类自身，客体是社会和自然。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自然”，不仅包括存在于人身之外的外在自然界，而且还包括人类自身与生俱来的本能、人体固有的各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属性。

由此说来，“文化”一词在当今世界哲学和各门科学都取得了重要发展的历史环境下，它的实质性含义应该是人类主体通过各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实现的对社会和自然客体的适应、利用和改造。其实现成果的体现既表现在各种自然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和发展，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完善。因此，我们认为，文化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

二、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

文化分为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将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广义文化又称“大文化”，它包括的领域甚广，如认识领域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等，艺术领域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器用科学领域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相关的制造技术等，社会领域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这里既有物质文化，又有精神文化。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

狭义文化又称“人文文化”，是以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传承累积而自然凝聚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总体体系，它指的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即精神文化。它涵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道德伦理、政法制度、文物典章、宗教信仰、哲学美学和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又可分为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和不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前者如政法制度、道德伦理、宗教哲学和大部分艺术等。

一般来说，研究者们对文化的研究主要从物质、制度、行为、精神四个层面展开。

(1)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生产活动本身，这些产品包括饮食、服饰、建筑、交通、房屋、生产工具以及乡村、城市等。物质文化是可以感知的，具有实体性的特点，是人类其他文化创造活动的基础。物质文化成果反映了人类认识、利用、改造自然的程度，反映了一个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2)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其主要包括法律制度、礼仪俗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人才培养选拔制度等内容。人的活动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只有按照一定的规则，才能有序进行。为此，人类在创造物质的同时，又创造了协调、约束的体制，用来规范人们的行动。

(3)行为文化。行为文化是指人的生活方式、实际行为、态度、价值等，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主要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行为文化见之于日常生活，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它既有物质的和制度的规范，同时又有社会和风尚习俗的具体表现。《礼记·王制》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汉书·王吉传》曰：“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都是对于行为文化的确认。行为文化带有集体的性质，往往以类型或模式的形式出现。

(4)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价值观、审美观、伦理观、思维方式等。精神文化又可以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两个部分。社会心理是指人们日常的精神和思想面貌，诸如人们的情绪、欲望、要求等，比较直接地受到物质和制度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社会意识是指经过系统加工的文化形态，它往往是由专家学者对社会心理进行归纳、完善、整理，并以物态化形式出现(如著作、艺术作品等)，以传播四方和后世。

三、文化的特性

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产物，带有普遍社会化特征。而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又会使文化呈现出多样性来。具体来说，文化的特性有以下几点。

(一) 普遍性

人是以社会化形式存在的，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社会化产物，是人类长期的社会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它为人类社会成员所共有和分享。不被人类社会成员接受和理解的事物，不属于文化。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那些积极的、健康的文化因素，往往会被人们接受，成为人类普遍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二) 时代性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文化具有很强的时代色彩。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带有明显的时代标志。每个时代的文化，在继承前个时代文化的基础上，根据所处时代的需要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其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同时，一个时代的文化，往往又和一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例如，以

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为标志的石器时代的文化、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铁器时代的文化、蒸汽机时代的文化、电力时代的文化与信息时代的文化。

(三) 地域性

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地理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文化自然就具有地域性。文化的地域性往往是和文化的民族性相关的，因为一个地域的民族在结成社会共同体的时候，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会体现出一致性和地域性。当然，文化的地域性比民族性有着更为宽泛和灵活的机制。例如，就中国的地域文化来说，有北方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

(四) 民族性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民族文化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其形式是多姿多彩的。

四、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即中华民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创造的文化。中国文化不仅是指汉文化，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

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都有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传统文化产生于农业时代，主要指封建社会的文化；现代文化产生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创造与发展的新型文化。顾伟列在《中国文化通论》中指出：“传统与现代之间本无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可寻，文化转型也绝不意味着文化断裂。”因而，本书所讨论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是指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大体上经历了上古原始文化、殷商西周文化、春秋战国文化、秦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文化、隋唐文化、两宋文化、辽夏金元文化、明清文化等发展阶段或时期。本书对中国文化的阐述，重点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对传统的关照，需要现代的眼光，本书在真实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之时，也力求用现代的眼光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构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知识延伸

20 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曾说：“在近 6 000 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26 种文化形态，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即古代中国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古代中国文化这一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背景和发展历程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背景

自从中国迈进文明社会的门槛，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了五千多年，无论王朝更替或战乱频仍，无论外族入侵或自然灾害，都未能阻止它前进的步伐，这与其生成背景有着直接关系。中国的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既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形成的基础，也决定了其独特的文化类型。

(一) 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人类文化的发展史表明，地理环境是历史文化赖以发生发展的物质条件。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如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凭借其海洋地理优势，带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而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却被毁灭了，其中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地理条件因素。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周围，是大片的沙漠，人类能够生存的地方实在太少，因此族群之间为争夺生存居住地的斗争过于残酷，在遭遇外族的入侵时一蹶不振，最后导致其走上了毁灭的道路。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端，东临茫茫沧海，背靠高山大漠，西南山高水险，疆土极为广袤，内部平原广阔，这种一面临海，其他三面与域外陆路交通极不便利的地理环境，加上古代后期屡屡出现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不仅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也造就了“中国中心主义”的心理定式。这种地理环境和心理定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无影响。

首先，这种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相对良好的气候条件，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人文哲学思想的生成、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种相对发达的农业文明社会里，人们适应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方式，也养成了中华民族相对温和的性格和安于现状的心理。

其次，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发性、独立性和一贯性。尽管异族入侵，但其文化却不曾中断。而且，在文化的融合和吸收中铸造了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念和文化心理，形成了其特有的自成体系的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

再次，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助长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思想，把“天下”视为中国，把环绕华夏的邻邦视为夷狄蛮戎。

最后，这种偏居一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反应机制”，历史上虽有外族入侵，但幅员辽阔、回旋余地宽广的地理环境使中国纵使丧失了部分国土，仍有广大退路可供回旋，所以唯中国能对周边各民族潜移默化，在吸取消化周边和外来文化的同时，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风格和系统完整，并使之绵延不绝，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超常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 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

中国地处东亚大陆，幅员辽阔，虽耕地面积较少，但泥沙冲积形成的肥沃平原，以及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给中原大地带来了充沛的降水，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中华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

自先秦以来，历代统治者都将农业生产作为立国之本，重农抑商成为社会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基本思想。在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里，商人是受重视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把民众按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通常来自地主阶级，农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这两个行业普遍受到社会的尊重，人们往往以出身于“耕读世家”为荣。读书人虽然不亲自耕地，但一般出身于地主家庭，家庭的兴衰和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都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再加上他们受过教育，使他们能够表达农民自己没法表达的思想，这种表达在中国就表现为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形式。历代王朝把重农作为治国之道，以农立国的国策、农耕工具的改造和耕作技术的提高，大大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为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而且是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务实精神、中庸之道、尚农与重农思想、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共存、安天乐土的生活情趣等，都与这种经济背景相关。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封闭的生态环境条件下，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产物。

(三) 宗法制的伦理社会

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的一种制度。所谓宗法，就是中国古代社会规定嫡、庶系统的法则。宗法关系是由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蜕变而来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宗法建立在宗族的基础之上，宗族由若干个同血缘的家族集合而成，由家庭而家族，再集成宗族，结成乡社，进而成为国家的基石。在宗法制度下，家族—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统治和服从为内核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共同体。它对国家与社会具有维系秩序的功能，同时，对国民性格的塑造也有深刻的影响。

在古希腊，希腊人在跨海迁徙中，伴随着移民浪潮，不同种族的人出于利益驱动，打破了原有的血缘纽带，出现了杂居和债务奴隶，传统上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氏族贵族统治日趋弱化，城邦式的国家随之产生。而中国却与之不同，几千年来沿袭的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传统农业模式，国民的主体——农民大多稳定地聚族而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强化了安土重迁及服从权威的国民心理。因此，宗族为了加强自己的团结，宗族血缘意识就作为一种天然的纽带被保留了下来。因血缘关系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被世代保存了下来，土地转化为贵族专有，首领转化为地方官员，族人尊崇共同祖先以维系亲情。随着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宗庙祭祀制陆续确立而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模式。中国的社会制度可以称为

“家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是通过家族来理解“国家”这个概念的，“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从先秦至明清，尽管社会形态有所变化，但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结构却长期沿袭未变，为维护这种组织形式，严格规定了辈分、嫡庶、长幼、主从等等级秩序。他们认同宗法等级的“合法性”，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道德倾向，偏重道德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亘古不变的核心地位。

知识延伸

1935年，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提出北起黑龙江瑷珲（今黑河市南）、南达云南腾冲划一条直线，把中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迥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域，这便是国际学术界著名的“胡焕庸线”。该线大致为倾斜 45° 基本直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为游牧民族的天下。这与欧洲农牧相间结合、亦农亦牧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同时，由于从南到北温度和干湿度的变化，决定了秦岭—淮河以南的中国南方产业结构以稻作农业为主，秦岭—淮河以北至长城的中国北方以粟作农业为主，而长城以北则以游牧业为主。自然地理造成长期性的文化基因传承和沉淀，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农耕与游牧文明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主体。一般来说，农耕民族依恋土地，重农轻商，居安思危，保守平和；游牧民族迁徙不定，重牧轻农，勇猛好斗。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有过长期的对垒，如军事上有长城的建筑、战争的对立，文化观念上如中原与周边、内地与边疆、蛮荒之地与礼仪之邦等的对立。但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途径达到彼此交流，互相融合。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悠远浩博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孕育发生到恢宏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

（一）上古：中国文化的发生

中国先哲与当代学者往往以“上古”来概括发明并使用文字以前的历史阶段，而这一遥远的文化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端的初始阶段。

1. 中国人起源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有了人，就开始有了历史，也开始有了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与中国人起源实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

1965年5月,考古学者从云南元谋上那蚌村发现了距今约170万年的猿人化石,定名为元谋人,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的历史确证。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的直系远祖腊玛古猿的许多材料,以及人类从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到晚期智人(新人)各个发展阶段的丰富材料相继发现,使得世界上迄今只有中华大地在人类起源的各个环节中没有缺环。

根据人种学分类,中国人属蒙古人种。从元谋人、蓝田人到马坝人、大荔人,再到山顶洞人,颧骨高突、铲形门齿、印加骨、额中缝等一系列现代蒙古人种所具有的典型体征在明显的进化趋势中一脉相承。

从古猿转变到人类,这是两大物质形态之间的转变,是生命物质所实现的质的飞跃,而文化就产生于从猿到人的转变中。

2. 原始物质文化

在文化产生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工具。猿人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和简单加工的石块,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从元谋人直到距今约7000年前的四川资阳人均处于这一时代。

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取火技术的发明权有时记在“燧人氏”名下,有时记在“伏羲”名下,有时又归功于“黄帝”。这种歧说并陈的现象,正反映了原始初民经过广泛的、多渠道的实践才发明取火技术的文化史的本来面目。揆诸考古学实证,元谋人是否已学会用火,学术界尚有争议,而北京猿人文化遗址内已发现灰烬,出土了大量因烧灼而变色破裂的石块、骨骼,甚至还有木炭。这充分证明,距今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能熟练地使用火,并能有效地保存从自然界取来的火。关于火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恩格斯有精辟论述。他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他又肯定地指出:“甚至可以把这种发现看做人类历史的开端。”如果说制造石器使人与动物开始分离,那么,火的使用标志着人与动物的最后诀别。

在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工具,不仅是人类物质文化的开端,而且直接标志着文化的起源。

从距今7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迄今为止,已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达七八千处。其中最著名的类型,有仰韶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1921年发现于河南),大汶口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1959年发现于山东),红山文化(其年代约与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当,1935年发现于辽宁),良渚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至前2400年,1936年发现于浙江),马家窑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800年至前2000年,1923年发现于甘肃),龙山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1928

年发现于山东), 屈家岭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2875 年至前 2650 年, 1954 年发现于湖北)。

3. 原始观念文化

与物质文化长足进展的同时, 中华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式。

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 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

对大自然(太阳、土地)的崇拜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 在仰韶、屈家岭、马厂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 人们往往发现表现太阳图形的纹饰。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四川珙县、云南沧源、广西宁明的新石器时代岩画上, 也清晰地出现了太阳神的形象。民间长久流传的“地母”之说以及古文献中“郊祀社稷, 所从来尚矣”(《汉书·郊祀志》)的记载, 则透露了先民土地崇拜的踪迹。此外, 太阳、土地以外的自然物, 也为中华先民所崇拜: “山林、川谷、丘陵, 能出云, 为风雨, 见怪物, 皆曰神。”(《礼记·祭法》)

中华先民对于自身的繁衍非常关注, 由此产生炽热的生殖崇拜。从辽宁牛河梁和东山咀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陶塑女神像, 在相当广阔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男性生殖崇拜物——石祖、陶祖, 发现于新疆呼图壁县境内的大型生殖崇拜岩画, 都展示了人们生命崇祀的庄严情感。

中华先民一方面重视子孙的繁衍, 另一方面也崇敬创造生命的祖先。在母系氏族社会, 主要是供奉女性祖先, 随着父系社会的到来, 男性祖先日渐成为供奉对象。祖先崇拜往往有严格的仪式, 在这些仪式中, 中华先民虔诚地寄托对祖先创造生命的崇拜。

与自然崇拜和生殖—祖先崇拜相比, 图腾崇拜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图腾”一词源自印第安语, 意为“属彼亲族”。由于在原始思维中, 类比和联想是主要方法, 中华先民一般都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联系, 并以之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 这就是“图腾”。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中, 有丰富的图腾崇拜资料。相传黄帝率熊、罴、貔、貅、豹、虎六兽同炎帝殊死搏斗, 这六兽其实是指以其为各自图腾的六个氏族。鱼、鸟、蛙、龟、蛇、猪、马等实有自然物以及人们运用抽象的、概括的思维创造出来的对象, 如龙、凤等, 都曾中华先民崇拜并奉为本族徽帜的图腾物。

对于后世文明意识来说, 原始宗教无疑充满了种种神秘色彩, 然而, 在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处于低水平的原始时代, 它具有在人与自然之间起协调作用、在本能与文化之间起制约作用、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起补充作用、在人的精神需要中起主观自足作用等文化功能上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正因为如此, 原始宗教才能成为原始时代观念文化的主流。

在原始观念文化中, 原始艺术亦有生动发展。在距今 4 000 年的河南密县池北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 发现了陶塑猪头, 这是最早的陶塑艺术品。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头像, 隆鼻、凹眼、大耳, 耳垂部位有穿孔, 可见当时人们已有在耳朵上悬垂

饰物的习俗。陶绘是原始艺术的又一样式，考古发掘表明，原始时期的陶绘图样千姿百态，几何纹样，动物、植物图形都是先民创制陶绘艺术的基本素材。原始雕刻艺术亦有众多发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纹骨，刻有勾嘴、修尾的水禽，线条流畅，姿态生动。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象牙筒花瓣交错，结构别致。江苏连云港锦屏山的将军崖岩画与新疆呼图壁县内的生殖崇拜岩画皆气魄宏大，画面生动展现了先民粗犷的情感以及一派活泼天真、生机盎然的人类童年气息。

4. 原始社会组织

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古时代主要有男女通婚关系，以及由此关系制约的氏族关系。其组织形式则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

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中华先民在婚姻关系上经过血亲杂交、血缘群婚、族外婚等阶段，在社会组织形式上经过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阶段。大致地说，母系氏族社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形成，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氏、庖牺氏、神农氏、有巢氏、燧人氏，是这一时期中华先民创造的神。

父系氏族社会则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私有制开始萌生。传说中的五帝，便生活在这一时期。五帝的组成，有多种说法。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五位上古帝王。

氏族制后期，部落联盟产生，其首领推举方式即著名的禅让。传说，尧在位七十余载，衰老之际，知子丹朱不肖，看中了贤孝而有才的舜，经过多方考验，“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舜到暮年，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

禹的时代开始了今天已初显轮廓但尚有争议的“夏文化”的进程。依据考古发掘和零碎的文献资料，夏文化大致具有如下特征：工具形态由石器、陶器过渡到青铜器；农业生产已有相当发展；私有制确立；中华文化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建立起来。

5. 上古文化分布

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发生，一开始即呈多元状态。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甚至东北和华北地区，都有旧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广泛发现。基于考古实迹，学者们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多元发生的新解释。1977年，夏鼐划分中国古代文明为七大区域：中原地区、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黄河下游和旅大地区、长江中下游、闽粤沿海、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苏秉琦则划分起源期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六大区系：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省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

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发生，不仅有考古学方面的充足证据，神话传说及民族学、民俗学研究表明，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

中华先民的一部分，很早就自称“诸夏”或“华夏”，或单称“华”“夏”。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

分布区。华夏集团内又分两支，一支称黄帝，另一支称炎帝。神话传说中那位桀骜不驯的共工氏，也属于这个集团。

东夷集团的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青莲岗文化江北类型分布区。与黄帝恶战的蚩尤、射日的后羿，都属于这个集团。

苗蛮集团主要活动于重庆、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如若向东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也可归于此集团。大名鼎鼎的伏羲、女娲都属于这个集团。

在中国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前夕，黄河流域出现了一系列部落联盟之间的兼并战争。首先是炎帝、黄帝诸部联军在涿鹿大败蚩尤，从而完成了炎黄诸部与蚩尤部落的融合。继之而来，炎黄二帝发生冲突，阪泉一战，黄帝打败了炎帝，炎帝溃败，向东南方转移，黄帝因此成为华夏集团的代表。

经过对东夷集团以及稍后对苗蛮集团的征战，华夏集团取得连续胜利，从而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元发生中的主流地位，对后世文化发展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

从人猿叩别、文化开始发端，到传说中的禹“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史记·夏本纪》），中国传统文化在自身的生命运动中，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然而，其社会组织结构方式，婚姻演进方式，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包括图腾崇拜、灵魂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在内的精神生活，和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化大体一致。至殷商西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面貌才开始形成。

1. 殷商神本文化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与此相适应，商人的都城一再迁徙，史称“不常厥邑”。

大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族在盘庚的率领下，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徙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此传位八代十二王，历时 273 年。

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这些由掌理卜筮和记事的“贞人”书写与保管的典册，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献。这些文献虽然“诘屈聱牙”，散漫无序，但其间已包含有丰富的文化思想。文字、典籍、青铜器，以及“殷”这座目前所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古都，标志着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以殷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

关于殷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古代典籍屡有记述。《礼记·表记》便称：“殷人尊神，率

民以事神。”

殷人观念中的神，地位最高的是“帝”或“上帝”。它统率各种自然力，也主宰人间事务。为了听命于上帝，按鬼神意旨办事，殷人以下箠来决定自己的行止。商王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最高祭司。以尊重鬼神为特色的殷商文化，是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产物。随着人们的实践经验日益丰富，智力、体力水平不断增进，对神的崇拜渐次淡薄，对于自身能力的信心与日俱增，于是，以神为本的文化逐渐开始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其契机便是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

2. 周人的文化维新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来说，周人入主中原，具有决定文化模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周”是一个历史几乎与“商”同样悠久的部族，作为偏处西方的“小邦”，它曾长期附属于商。经过数百年的惨淡经营，周族逐渐强大，并利用商纣的腐败和商人主力部队转战东南淮夷之机，起兵伐纣。公元前11世纪，“小邦周”终于战胜并取代“大邑商”，建立起周朝。

周朝建立后，一方面因袭商代的种族血缘统治办法，一方面实行文化主旨上的转换，正如《诗经》所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缘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虽然汉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其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却依然维系下来，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除了建立完备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将上层建筑诸领域制度化外，周人的另一文化创新，乃是确立把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固定下来的礼制和与之相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乐)，这便是所谓“制礼作乐”。

周代的礼制是周代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典章制度的总汇，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周人之“礼”，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侧面。其形式为“仪”，即各种礼节和仪式。周制规定，各级贵族祭祀、用兵、朝聘、婚丧，都要遵循严格的合乎其等级身份的礼节仪式，以体现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上下尊卑之别。战国时人编纂的《仪礼》(又称《礼经》)一书，便是对西周仪礼的追记和理想化描述。“礼”的内容，一是“亲亲”，贯彻血缘宗族原则；二是“尊尊”，执行政治关系的等级原则。周代礼制的内容与形式统一在其主旨上，就是“别贵贱，序尊卑”，以保证“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礼记·丧服四制》)。范文澜曾指出，周文化是一种“尊礼文化”。王国维也说，“礼”是“周人为政之精髓”，是“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这些论断深刻地表明了“礼”在周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周人所确立的“礼”，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以强劲的力量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行

为、心理情操与是非善恶观念。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或“礼制文化”，即创制于西周。

周人推行的种种制度典礼，如分封制、宗法制、礼制，实质上无不渗透着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周初统治者在总结夏亡商灭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重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的致思趋向，皆肇始于此。

（三）春秋战国：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

公元前 770 年，在犬戎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周平王从关中盆地丰镐东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从而揭开了春秋战国的帷幕。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云合雾集，竞相争霸。据文献记载，春秋 300 余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战国 250 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 220 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然而，在这充满血污与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

1. 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契机。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2. 百家兴起及学派特征

所谓“百家”，当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对于其间主要流派，古代史家屡有论述。

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区别“所从言之异路”，予以评论。西汉刘歆又将诸子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

说十家。

诸子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这就是“救时之弊”。由于社会地位、思考方式和学统承继上的差异，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来说，在天道观方面，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甚至声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在历史观方面，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封建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因而，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当然，道家和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对立，而是存在着相互接近、相互沟通的质素。例如，在天人关系上，儒家虽然有“天人合一”之说，但其主调仍然是宗法伦理，所以天人谐调还是要归结为人际谐调。道家则有所不同，它既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作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这就使天人谐调从人际谐调的从属地位独立出来而成为“第一义”。而且，道家所谓的“自然”，绝不等同于儒家的“天命”或“天理”，它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适的情趣。在这个角度上来把握与发挥天人关系的作用，恰好可以补救儒家在这方面的缺略，给局限于人伦日用世界的儒家学说打开新的天地。人性是复杂的，人生是多变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世不少士大夫文人正是从儒家指示的这条“独善”之路找到了通往道家思想之门。儒和道，就这样由对立走向了互补，相反而又相成。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刑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嗣后，李悝编成《法经》，商鞅实行“法治”，申不害、慎到相继提出重“术”、重“势”的思想，至韩非集法（政令）、术

(策略)、势(权势)之大成，建构成完备的法家理论。法家学说的思想方法是一种“矛盾不可和而解”的专讲对立的极端辩证法，故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峻法，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法家是战国时的“显学”，后来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汉以后，儒学独尊，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彰地发挥效应，历代统治者多采取“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术，有的则是“阳儒阴法”。

墨家的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墨家在战国时亦属“显学”之一，“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但在秦汉以后，墨家丧失学派生长的适宜氛围，逐渐消失无闻，直到近代方出现复苏之势。

以邹衍为最重要代表人物的阴阳家，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所谓“阴阳消息”，即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构成自然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而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的把握世界则是阴阳家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

3. 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的特殊文化环境，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轴心时代”的确立提供了契机，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华夏族的最终形成。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各古老部族，在诸侯国攻伐不已的兼并战争中统一到少数几个大国的版图之中，其中北方的狄族多为晋所兼并，西方的戎族多为秦兼并，东方的夷族多入齐、鲁，南方的苗蛮及华夏小国，则为楚所统一。过去华夏各国视为蛮夷的秦、楚二国，经过春秋时期约300年的变迁，已实现华夏化，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礼仪文化等方面与华夏趋于一致。自此，中国燕山以南、长江以北的黄河中下游及淮、汉流域广大地区的居民，已基本上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而不再有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

(四)秦汉：一统帝国与文化一统

公元前221年，经过多年兼并战争，秦王嬴政终于完成“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的一统帝国——秦王朝建立。秦王朝统治未久，便因统治政策的失误而被农民起义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刘邦建立的

汉朝。

1. 宏阔的文化精神

秦汉王朝具有宏大的规模和气象。秦帝国是与东地中海的古罗马帝国、南亚次大陆的孔雀王朝并立而三的世界性大国；汉帝国的版图与事功更在秦之上，与其同时并立的世界性大国唯有古罗马帝国。

秦汉帝国的盛大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

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内部，激发了工艺、学术的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秦汉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动是汉武帝时期使丝绸之路得以开辟的张骞通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产品远抵西亚和欧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2. 文化统一与思想统一

秦汉统治者在建立一统帝国的同时，还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

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许慎《说文解字·叙》）。秦始皇统一天下，雷厉风行地扫荡这种种之“异”，建立统一文化，其重要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与统一工作。李斯以周朝大篆为基础，汲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人称“秦篆”的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作为官方文字，颁行全国，是为“书同文”。

第二，定车宽以六尺为制，统一车辆形制，一车可通行全国，是为“车同轨”。与此同时，秦始皇调派民夫，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东抵燕齐，南达吴楚，两年以后，又修筑咸阳通九原（今包头西北）的“直道”。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与各地的联系，畅通了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

第三，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结束战国时期各国货币、度量衡标准制度混乱的局面，是为“度同制”。

第四，“以法为教”，并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统一人们的文化心理，是为“行同伦”。

第五，废除周代以来的封土建国制度，粉碎地区壁垒，将东至大海，西达陇右，北抵阴山，南越五岭的辽阔版图统一于中央朝政的政令、军令之下，又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开发边境地区，传播中原文化，是为“地同域”。

秦始皇统一文化的措施固然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为目的，同时也有力地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各区域人们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时期的文化统一，还包括思想学术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对中国文化其后的历程影响至深至巨。

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庄子·天下》都是这种尝试性的作品。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前 239 年)的《吕氏春秋》更系统地展示了这种努力。《吕氏春秋·不二》宣称：“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秦统一天下后，更执着于“别黑白而定一尊”。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 年)，李斯上奏，建议始皇采取强硬措施，“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隋书·牛弘传》)，从而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

思想的专制必然引起思想的反抗，就连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都不满其为人刚愎自用，逃亡而去。秦始皇闻讯大怒，严令追缉，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史记·秦始皇本纪》)。焚书坑儒，开历史上君主思想专制的恶例。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以其酷烈性而激起后世儒生士大夫的反复抨击，然而，实行思想统一乃是君主专制政治下无可回避的历史任务，正因为如此，当西汉王朝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盛，统一思想的课题便再次被提出，其倡导者就是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董氏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这番话就对“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态度而论，与李斯向秦始皇上焚书议截然相反，但就禁绝异端、发扬帝王一统意志而言，董仲舒与李斯可谓异曲同工，前后映照，他们两位都是在统一的专制帝国建立后设计“大一统”思想体系和文化形态的主要智囊人物。不过，与鼓吹“以吏为师”的李斯比较，董仲舒要高明得多，他以“六经”为指针，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寻找到了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一专制君主政体比较吻合的文化形态，其独尊儒学的主张因而不仅被汉武帝采纳，推行于当世，而且在汉至清的两千年间行之久远。

3. 儒学独尊与经学兴起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推行，使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原来并不专属儒家的“古之道术”渊薮——《诗》《书》《礼》《易》《春秋》，亦一变而为儒家独奉的经典并被正式尊为“五经”。到了东汉，又增加《孝经》和《论语》，合称“七经”。

西汉统治者既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复“立五经博士”，并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天下学士多靡然风从，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这就是汉

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经学”。

汉武帝以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成为儒家经典的一统天下。然而，经学内部却因学术派别不一，爆发出今古文之争。

所谓“今文经”，即朝廷为了便于经学流播，下令搜集流散民间、口头流传的儒家著作，写为定本，作为传述的依据。由于这些经书系用当时流行的文字记录整理，遂有“今文经”之称。所谓“古文经”，即鲁恭王刘余、北平侯张苍、河间献王刘德等人通过种种途径所发现的儒家经书，这些经书系用古籀文写成，故称“古文经”。“古文经”不仅在文字上与“今文经”大不相同，而且在篇数上也不一致。

自西汉末古文经出现，学者内部就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派，他们不仅围绕“今文经”与“古文经”的版本、文字以及真伪展开激烈争论，而且在学术观点以及学术研究的原则、方法上也有重大分歧。概括地说，今文经学的特点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内涵。前者主合时，后者主复古。前者学风活泼，而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后者学风朴实平易，但失之烦琐。

从武帝时代直到西汉末，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在今文诸经中，《春秋公羊传》尤为重要，以治《春秋公羊传》起家的董仲舒，在著名的今文经学著作《春秋繁露》中，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从而建构起天人一统图式，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古文经学在王莽摄政时迅速发展，东汉继续发展，大学者辈出，贾逵、服虔、马融、许慎为其中佼佼者。东汉末年，马融的学生郑玄遍注古、今文群经，不拘泥于师承门户和学派壁垒，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五）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汉末董卓之乱，使久已摇摇欲坠的汉帝国终于崩溃瓦解。与此同时，北方游牧人如洪水一般从高原横冲直下，同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一场长达近四百年的战乱由此展开，政治舞台上角色更迭如走马灯般令人眼花缭乱。在全国范围内，先有魏、蜀、吴三国鼎立；继之而起的西晋命祚短促。随晋亡而来，在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嬗递。在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起伏更替。

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1. 玄学崛起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宋书·谢灵运传》）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

玄学的产生是从两汉到魏晋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自从西汉后期儒学被定为一尊

后，由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杂糅搭配而成的、包罗万象的宇宙论，成为大一统的汉帝国巩固其统治的理论基础。与此相辅而行的是对儒家经典进行种种烦琐解释的“经学”。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这个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论的神圣光圈黯然失色，经学也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烦琐学问。统治阶级的腐败以及社会大动乱更有力地宣布了儒学的“不周世用”和思想的虚伪。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

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玄学在主体面貌上与两汉儒学大不相同。两汉儒学着眼于构建实实在在的王道秩序与名教秩序，玄学却以探求理想人格为中心课题；两汉儒学热衷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魏晋玄学却从汉代的宇宙论转向思辨深邃的本体论。玄学的兴起，对魏晋文化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玄学的思维特点是超脱多样化的现世实物而直接诉诸本体。对本体的思考，对无限的思考，当然不能依靠纯经验性的观察，而必须运用抽象的哲理，一股力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思辨新风注入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躯体，使之产生了新的活力。魏晋学术亦因此而富于谈玄析理的色彩。

第二，玄学虽然以超越有限达到无限为根本，但玄学家所说的达到无限，不是像西方黑格尔哲学那样以达到对“绝对理念”的纯思辨的抽象把握为最终目的，而是在现实的人生之中，特别是在情感之中去达到对无限的体验，这就使玄学与美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兴起的重神理而遗形骸、重自然而轻雕饰的美学观念，以及新兴的山水诗与山水画等，便深深浸染着玄学风采。

第三，玄学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其现实意蕴是对魏晋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做理论上的建构。在“贵无”思想的深刻影响下，魏晋士人或徜徉山水，“琴诗自乐”，追求一种“萧条高寄”的生活；或“动违礼法”，“以任放为达”。陶渊明与“竹林七贤”便分别是以上两种行为方式的代表。在魏晋士人的推动下，老庄之学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占据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进而铸造了当时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2. 道教创制与佛教传入

玄学的兴盛，体现出动乱时代人们对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也成为道教与佛教兴盛的土壤。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刘宋庐山道士陆修静借政权之力清理民间道派，并首次使用“道教”一词统一各道派。与此同时，道教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宗教仪式和斋醮程式、道德戒律。齐梁时的陶弘景更以“天子师”之尊构造道教神仙谱系，叙述道教传授历史。道教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宗派至此基本定型。

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的一般性特征，但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这就是在思想渊源上从道、儒、墨等哲学流派以及传统星相家、医方家、讖纬家那里充分汲取思想资料；在神仙世界的构造上以古代中国尤其是流传于楚文化

圈的种种神话人物为本源；在教旨上，以长生成仙为目标。与全力关注“人死后如何”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道教最关心的是“人如何不死”。这一致思趋向正是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

与道教勃兴的同时，佛教也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由此形成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

3. 儒、玄、佛相与激荡

儒、玄二学在魏晋时期冲突甚为剧烈。虽然儒、玄二学相互排斥，但是二者也有相互吸收的一面。“儒玄双修”之士的大量涌现体现出那一时期儒玄合流的趋势。

道教从诞生之日起便与老庄之学结下不解之缘，道家哲学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与宗教理论的主干。道家的创立者老子被奉为道教教主，庄子也被列为道教尊神。《老子》《庄子》二书被奉为道教经典，称《道德真经》与《南华真经》。与此同时，道教积极调和儒学，将儒学中的伦理精义纳入教义、教规之中。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曾描述儒、道二教关系：“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

佛教和玄、儒、道的关系颇为复杂。大体而言，玄、佛一拍即合，到了东晋，玄学几乎完全融于佛教之中。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调和（道教徒也有主张调和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二学，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与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

（六）隋唐：隆盛时代

公元7世纪，当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及其身后的“哈里发”（意为“继承者”“代理者”）建立起横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之时，在东亚大陆，杨隋和李唐相继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建立起东临日本海、西至中亚细亚的隋唐大帝国，在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了气度恢宏、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

1. 文化背景

隋唐文化的气象恢宏，与地主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魏晋南北朝，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他们凭借门第、族望而世代盘踞高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高门大姓”以外的庶族或寒门则进身不易。然而，门阀士族势力在隋唐时期趋于急剧没落。给予门阀地主致命打击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继之而来的则是杨隋和李唐政权所推行的包括均田制、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全面压抑门阀士族的改革措施。在门阀士族衰落的同时，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入仕途，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从而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士族的垄断。

2. “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

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文化首先体现

出来的是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李世民与以魏徵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艺上积极鼓励创作的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这样一种文化政策基本上为李世民的子孙们所继承。对待文化人，唐王朝也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儒学可被嘲讽，诗人作诗也少有忌讳。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感叹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由此可见唐代文化开放的氛围。

唐文化的宏大气魄还体现在以博大的胸襟吸收外域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及至马球运动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一拥而入。隋唐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称为卓越范例。英国学者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所谓“有容乃大”，正是唐文化超轶前朝的特有气派。

3. 风采辉煌的艺术成就

唐王朝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宽容和摄取，造就了丰富浓烈的艺术世界。

中国文学的首唱是诗，而中国诗的辉煌巅峰则在唐代。闻一多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欲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

这是一个诗歌创作空前活跃的时代。仅清代所编的《全唐诗》中，就有作品 48 900 余首，诗人 2 300 余位。正是唐代诗人的杰出创造，中国古典诗歌“无体不备，无体不善”，内容、风格、形式、技巧，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

与中国诗的历程几乎一致，中国书法在魏晋六朝开始走向美的自觉，在唐代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这一时期篆书圆劲，阳冰篆法为后世所多循；草书飞动，“颠张狂素”将狂草发挥得淋漓尽致；行书纵逸，李邕的《麓山寺碑》，颜真卿的《争坐位帖》最为艺林所重。正如唐代诗坛推出李白、杜甫作为中国诗歌典范性人物，唐代书坛也推出中国书法的宗师——颜真卿与柳公权，诚如苏轼所言：“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书黄子思诗集后》）

唐代是诗歌与书法的黄金时代，也是绘画的极盛时期。“画圣”吴道子改造传统线描技巧，“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吴道子以“莼菜条”画法的创造，大大提高了线条在画面上组织物象基本结构的功能，丰富了线条的美感因素，深刻地活化了线的生命力。在画科上，唐代绘画也是全面发展。人物画辉煌富丽，豪迈博大；山水画金碧青绿之美与清秀淡雅的水墨韵味交相辉映；花鸟画也登上画坛，规模初具。整个画坛新鲜活泼，充满生命活力，唐人张彦远用“灿烂而求备”一语概括唐代绘画的气派，其言确然。

唐代的散文也有丰硕成果，其领袖人物便是韩愈、柳宗元，他们所发起的古文运动，对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唐代便是古代哲人观念中“充实而有光辉”的文化繁盛时代。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中说：“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至唐代，显示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的灿烂风采，其辉煌令后世追慕不已。

（七）两宋：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勃兴

爆发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引发了潜藏已久的种种危机，以杨炎两税法的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土地国有制——均田制崩解，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迅速发展，直至占据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

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大势相呼应，中国传统文化亦从唐代文化转向宋代文化。

与唐代文化不同，宋代文化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这一时期，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还是社会风气，都在不同程度上浸润着宋代文化的特有风貌。

1. 理学建构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

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为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纂的《大学》，阐明了“修身”的方法：“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从“格物”到“致知”，实质上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亦即伦理学上的“自律”。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由于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则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但与此同时，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行，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2. 精致细腻的士大夫文化

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的士大夫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敛的风格。

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因文人介入而趋于雅化。与含义阔大、形象众生的诗不同，词小而狭，巧而新。

宋词雅，宋画也雅。苏轼在《跋宋汉杰画山》一文中提出“士人画”这一观念，强调融诗

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为总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豪迈之气与优雅细腻、温柔恬静之美。

两宋士大夫文化的其他领域，也无不表现出与宋词、宋画相通的风格。两宋古文舒缓和缓，阴柔澄定；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士人饮茶“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文人玩赏的瓷器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态。宋代服饰也以简朴清秀为雅。

3. 市民文化之勃兴

宋词、宋画、宋文以及宋代理学构筑成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还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市民文化。

两宋市民阶层的崛起，以中晚唐以来的都市经济发展为基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反映了当时繁盛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在熙熙攘攘、风波丛生的快节奏都市生活中，市民们无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浓郁迷离的诗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并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样式。

傀儡戏、参军戏是中唐以后流行于市井间的歌舞小戏。据史料记载，当这些歌舞小戏演出时，台下观众云集，大声应和，其情景颇为热烈。明确标明以“市人”为读者对象的“市人小说”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出现了固定游艺场所——瓦舍。每个瓦舍里划有多个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众多勾栏上演丰富多样的文艺节目，如杂剧、杂技、讲史、说书、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角抵、舞旋、花鼓、舞剑、舞刀等。瓦舍中士庶咸集，老少毕至，热闹非凡。

4. 教育和科技成就

宋代官学系统有两大特色，一是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等级差别不断缩小，如官学向宗学转化后无问亲疏，国子学向太学转化后无问门第，这样一种变化无疑有利于低级官僚子弟乃至寒素子弟脱颖而出。二是重视发展地方学校，至北宋末期，地方州县学发展到高峰，人称“学校之设遍天下”（《宋史·选举志一》）。教育的发展与深刻的变革使宋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超过汉唐，明人徐有贞指出：“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范文正公集》补编《重建文正书院记》）宋文化繁盛的基础正在于此。

在中国传统文化趋向成熟、精密化的背景下，古代科技在宋代亦发展至极盛。

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武器三项重大发明创造是宋代最为突出的科技成就。北宋贾宪、南宋秦九韶在数学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贡献。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沈括传》），且创见迭出。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医药学、冶金术、造船术、纺织术、制瓷术等方面也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前后的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科学理论研究，还是技术的推广应用，比起两宋来都大为逊色。陈寅恪为《宋史职官志考证》一书作序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指出了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八) 辽夏金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宋文化细腻丰满，但在气魄上远不及汉唐文化气势雄壮。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民族，而宋代自立国之始，就为外患所困扰，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

1.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双重效应

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下的产物。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在辽朝，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贞观政要》《史记》《汉书》等汉文化名著被译成契丹文字，广为流行；贾岛之诗成为儿童的启蒙读物；苏轼的诗更为辽人所熟悉和喜爱。在西夏，《孝经》《论语》《孟子》皆有本族文字译本，至宋仁宗时，西夏已是“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续资治通鉴长编》）了。在金国，儒学被奉为正宗道统，国学除学习经书外，还要学习《老子》《荀子》等诸子典籍，读《史记》与《汉书》等各朝断代史。汉地流行的典章制度也在金朝推行，其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金史·选举志》）。建立于幽燕故地的金中都，完全以汴京为模式，其设计和施工的主持者均是熟谙于儒学建都规制的汉族士大夫。金人对汉文化的汲取和整合，使汉族文化在新的条件下渗透、延展于女真族之中，从而在当地创立了一个“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王世贞《归潜志序》）的文化天地。

公元13世纪，来自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震荡着欧亚大陆，中华大地上相互对峙的金、南宋和西夏王朝，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扫荡下逐一崩溃。公元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蒙古上层贵族的争斗中获得胜利，登上大汗宝座，并取儒学经典《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

然而，政治的、军事的、民族的冲突，往往以一种形式上的对抗，促进着深刻的文化交融。元世祖忽必烈在汉族儒生士大夫的影响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漠北旧俗，“行中国事”，造成统治体系与文物制度的大幅度“汉化”。崛起于两宋，但一直处于在野地位的程朱理学，便在元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一跃成为官学，对后来的明清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2. 元杂剧及其文化意义

在元代，汉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离破碎，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进堵塞，于是，一部分穷困潦倒者与盛行于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密切联系。他们投身于杂剧创作，“以其有用之才”，“纾其拂郁感慨之怀”，表达那个历史时代深沉的悲愤、苦闷与抗争。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以及以包拯为主角的一系列清官戏，如《蝴蝶梦》

《鲁斋郎》《陈州糶米》等，便表现了当时人们的郁闷与愤懑之情。

元杂剧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西厢记》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它不仅充满激情地以完满的艺术结构展现出崔莺莺与张生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理想终成现实，而且高呼出向正统文化观念挑战的宣言：“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3. 规模盛大的中外文化交流

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是一个版图空前广大的帝国。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在这广袤的文化场中，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宏大的气势展开。

元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中国西部和北部的边界实际上处于开放状态，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大规模迁居中国。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汉语而又浸润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传统的回族渐趋形成。

亚欧大陆的沟通，亦为东方和西方旅行家远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公元 1275—1291 年，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南欧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足迹。这位威尼斯人回国后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在这本书中，他用梦幻般的语言，向西方人娓娓动听地描述中国的美丽、富饶和繁荣。从此，东方的中国成了西方人心目中遥远的梦，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远渡重洋，开辟新航道，都是为了追寻这一遥远的梦。

元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开放，使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他们之中，有不少科技人才。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入中国科技界。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发展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基础上充分吸取阿拉伯天文学成果，制定了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授时历》。《授时历》以 365.2425 天为一年，该值与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历完全相同。

与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中国传统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传入阿拉伯，再传入欧洲。中国印刷术也经由蒙古统治下的波斯以及突厥统治下的埃及传入欧洲。中国历法、中国数学、中国瓷器、中国茶、中国丝绸、中国绘画、中国算盘亦通过不同途径，在俄罗斯、阿拉伯与欧洲广为传播。

(九) 明清：沉暮与开新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文化的发展演变也大体上遵循这一规律。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其生命也有一个由生长到全盛到衰落的历程。明、清两代便处于这一历程的后段。同时它又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

明代与 1840 年前的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随着庶族地主力量的增长，以及屯田向私有和民田的转化，传统的地权占有形式发生变更；随着租佃关系上自由租佃的出现，永佃制、押租制的

发展，雇佣关系上封建性雇工向自由雇工的过渡，封建依附关系发生松解；与此相关联，某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在封建制度母体内出现。凡此种种，皆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阶段。

1. 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

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登峰造极的时代，文化专制亦空前严酷地钳制着思想文化界。

明清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是文字狱盛行。朱元璋以文字之“过”，“纵无穷之诛”，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横祸。与此同时，明代君主大量使用特务手段，特务机构厂（东厂、西厂、内行厂）、卫（锦衣卫）以士人为重点侦伺对象，“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明史·刑法志》）。清代文字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庄廷鑑《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文选》案”，均是康熙时期所发生的轰动全国的大案。

明清统治者一手推行文字狱，在文化领域制造恐怖；另一手则崇正宗、灭异端。朱元璋多次诏示，士人必须“一宗朱子之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又规定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的注为标准答案。于是，明初学术界成为程朱的一统天下，士子一味“尊朱”“述朱”，凡“言不合朱子，率鸣鼓百面攻之”（《名山藏·儒林记》），程朱理学被推上至尊地位。清代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上也不遗余力。乾隆年间，清高宗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全力剪除危及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异端”学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凡例》便开宗明义地宣布：“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掎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与直接干预《四库全书》纂修的同时，乾隆帝还一手操纵长达19年的禁书活动，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在“书禁亦严，告讦频起”的强大威慑力下，“士民惠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干家，惟恐召祸，无间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王芑孙《惕甫未定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秦始皇焚书以来的又一次巨大浩劫。

2. 早期启蒙思潮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社会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又出现了具有反正统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例如，以“致良知”之说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王阳明，虽然就其根本意旨而言是要修补朱学僵化所造成的缺漏，但他感应明中叶以来社会氛围和心理状态的变迁，从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上顺次展开宇宙论、认识论、价值主体论，从而否认用外在规范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造成对正统统治思想的一种反叛，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他的门生王艮以及“泰州学派”的传人李贽则走得更远，已有较为鲜明的反正统的气息。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唐甄、颜元、戴震、焦循等人，更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程朱理学展开论战，有的批判锋芒直指君主专制制度。

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学的兴起（其理论代表是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独抒性灵”口号

的提出，其代表作品为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某些新的生产方式萌芽的反映。生动活泼、富于民间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学，较之明代前期内容空虚、徒具华丽形式的“台阁体”文学，以及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都是一个巨大的跃进。至于清代出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则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弊端，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阶段同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文化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蕴的内容而言，都与文艺复兴较为相当。文艺复兴产生的经济条件是14—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16—17世纪的中国长江中下游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态势。文艺复兴的主旨是人文主义，其批判锋芒直指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而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也抨击宋明理学中的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王夫之《诗广传》），“私欲之中，天理所寓”（王夫之《四书训义》）等新的命题。

然而，由于在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以明清之际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潜书》，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就可以发现，虽然他们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猛烈程度上可谓东西呼应，但黄宗羲、唐甄等人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

3. 古典文化的大总结

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时期。

在图书典籍方面，明清统治者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收集、钩沉、考证、考辨，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大型图书的编纂，是古典文化成熟的征象，也包含着文化大总结的意蕴。

在古典科技方面，明清之交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例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和植物分类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作为一部治理黄河的专书，总结了我国历代治河经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总结了元、明两代劳动者的农业生产经验，还介绍了欧洲的农田水利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及经验，是一部称誉海外的工艺学百科全书。此外，地理和地质学杰作《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自然哲学专著《物理小识》等，都是封建社会后期科学成就的高峰。

在学术文化方面，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讲究训诂考据的经学派系（即“乾嘉学派”）对中国古代文献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整理与考据。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传承以及向前推进来说，乾嘉学派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

4. 西学东渐及其中断

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东来。他们在给中国人带来欧洲宗教神学的同时，也将近代的世界观念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技成就广泛传播于中国学术界，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以及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外来的科技知识。近代科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实证方法和数学语言，徐光启、方以智等人，通过接触西洋近代科技知识，重视“质测之学”和数学语言的应用，初步显示出近代科学思维的风貌。遗憾的是，由于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的强固以及伦理型文化传统的深厚沉重，“西学东渐”在明末清初进展缓慢。到了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士被逐出国门，“西学东渐”几近中断。

明清两代，正值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时，欧亚大陆的远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工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中国这一巨大的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传统文化推进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阶段。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动力，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体现了民族精神的历史性与民族精神特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

一、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问题，就其理论实质而言，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或者说是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其最基本的内涵，就是充分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关注人类行为与自然界的协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人合一”是正确的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思想。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也使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长发展。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于人类，

也不是一个超越的异己的本体，不是宰制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认识、可以为我所用的客观对象。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得到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自我身心平衡与自然环境平衡的统一，以及由于这些统一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了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破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以人为本

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确立，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嬗变，中国古代各种哲学派别、文化思潮的关注焦点，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目标的揭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展开。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超越宗教的情感和功能。换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本主义始终不占主导地位，恰恰相反，人本主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本主义思想传统，把道德实践提到至高地位，对于人的精神的开发和个体道德的建立，有着重要意义。它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用道德自觉抵制宗教强制，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当然，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由于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因素。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人本主义文化具有明显的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家族)轻个体的倾向，只强调个人的义务和道德人格的独立性，而不重视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

三、贵和尚中

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

贵和尚中的思想，作为东方文明的精髓，其积极作用和影响还是主导方面。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念上有认同感，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是中国人普遍的行为准则。这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无疑有着积极作用。

四、刚健有为

刚健有为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原则，是中国人的积极人生态度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刚健有为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日新”“革新”的观念在历史实践中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并积极促进“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社会变革。《礼记·大学》主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革卦》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种革故鼎新的思想，后来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朝野上下津津乐道的变革观念，成为有道讨伐无道的思想武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刚健有为密切相关，或者说作为刚健有为思想之重要表现，是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孔子认为，为了实行仁德，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决不苟且偷生。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他在自己的治国平天下方略不为统治者接受的时候，并不改变初衷，曲学阿世，而是坚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原则。他始终坚持，“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人生准则，决不与黑暗统治同流合污，因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成为后世坚持独立人格、保持自尊自重高尚气节的榜样。孟子明确表示“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他认为“大丈夫”应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气概，这种坚持独立人格的气节，成为烛照中华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力量。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思想家范缜，坚持真理，不“卖论取官”，便是受传统的独立人格思想熏陶的结果。这种坚持独立人格、注重“大丈夫”气节的思想，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

知识延伸

清末民初翻译家、散文家辜鸿铭于1915年出版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辜鸿铭在书中把中国人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对比，指出中国人同时具备深刻、博大、简朴和灵性四种美德，并主张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解决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改造。

第四节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和方法

一、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更

好地理解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指导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具体来说，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有以下几点。

（一）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

当今世界，人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地球村”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准确把握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比把握诸如皮肤、头发、眼睛的颜色等体质特征要困难得多。然而，任何一个民族，其文化都有特定的主色调、主旋律。我们之所以能够从芸芸众生中大致辨识各民族的特征，是因为每一个民族内部，固然存在着阶级、集团、党派及个人性格和教养的差异，但同时也深藏着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精神特质，这便是所谓的民族精神。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正是我们认识自己、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可靠途径。

（二）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而深刻地了解当前的国情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要真正实现这一梦想，前提是切实认清中国的国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程度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同时也带来了因袭的重负。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我们吸收得还很不充分，但其负面影响已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忧虑。深入剖析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对今日中国的影响，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我们走过的路，有助于我们准确且深刻地了解国情。

（三）有助于我们以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去继承传统，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是影响中国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传统。传统是社会的生存机制和创造机制，借助于它，历史才得以延续，社会的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才得以保存和发展。正因为如此，文化传统并非仅仅滞留于博物馆的陈列品和图书馆的线装书之间，它还活跃在今人和未来人的实践当中，并在这种实践中不断改变自己。每一个有志于为民族的未来贡献心智和汗水的中国人，都应当努力熟悉传统，分析传统，变革传统。

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掌握正确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十分重要，具体方法包括以下几点。

(一) 历史梳理和逻辑分析相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演化，内容异常丰富。既要对其来龙去脉有明晰的了解，又要把握历史进程中的逻辑，避免迷失于无法穷尽的枝节材料里。因此，只有将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考察，才能真正体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明白文化就是凝结在具体器物、典章、制度中的精神，从而真正回到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二) 典籍研习和社会考察相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在具有经典意义的文献之中，如《诗经》《周易》《论语》《老子》《史记》等。一方面，要带着“温情的敬意”去研读经典文献；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众多要素是以非文本的形式存留于社会生活之中，如起居习俗、宗教礼仪、道德规范等。这就要以开放的心胸，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文本之外的社会生活，将典籍研习和社会考察有机结合起来，相互比照、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从而对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动态的、全面的了解。

(三) 批判继承与开拓创新相结合

千百年来，无数的先辈对于滋养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过详尽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或否定这些成果。一方面，苛求前人，否定过去，打倒传统的非历史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被先辈的认识、成就所束缚，我们应该“接着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批判地继承前贤已经取得的成就，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发展。



知识回顾

文化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文化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文化的特性包括普遍性、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

中国的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既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形成的基础，也决定了其独特的文化类型。悠远浩博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孕育发生到恢宏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的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更加准确而深刻地了解当前的国情，以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去继承传统并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知识巩固

1. 简述文化的特性。

2. 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3.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包括哪些？
4.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是什么？